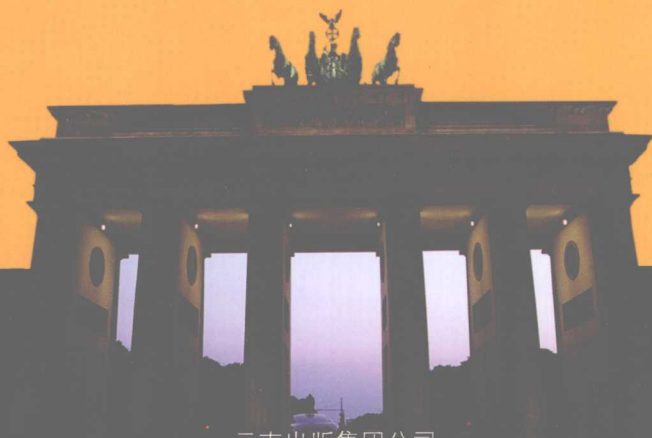




德国思想文化刍议

Streifzüge der deutschen Ideenkultur

杨艳华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德国思想文化刍议
Streifzüge der deutschen Ideenkultur

杨艳华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国思想文化刍议/杨艳华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 - 7 - 222 - 05637 - 4

I. 德… II. 杨… III. 文化史 - 研究 - 德国 IV. K516.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9241 号

责任编辑: 谢学军

封面设计: 王睿韬

书 名	德国思想文化刍议
作 者	杨艳华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 ynpph. com. cn
E-mail	rmszbs@public. km. yn. cn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4.25
字 数	100 千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昆明银河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 - 7 - 222 - 05637 - 4
定 价	18.00 元

作者简介

杨艳华，副教授，1978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德、法、西语系德语专业。1984年调入云南大学外语系教德语。曾担任德、日语教研室主任、兼任系主任教学秘书、1988年7月被聘为省外语翻译职改办德语职称评议小组成员。现任云南省翻译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高评委委员。担任云大外语学院党委，组织委员及教工党支部书记。曾两次被评为云南大学优秀党务工作者，2008年被云南省高等院校工作委员会授予“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总结多年的教学及翻译经验，出版了12万字的个人专著《德语科技术语及词的多义性》，翻译了德国电视台环保专题片《我们的气候怎么了》，在云南卫视“世界博览”栏目播出。撰写了《云南大学德语教学大纲》第1、2部份，11468字，合作编写了《纳西东巴文六国语词典》，负责德语部分。

1978—1984年担任德语翻译，德语工业技术口、笔译工作。先后在武汉钢铁公司、天津大港化工厂、云南省昆明从德国引进设备的企业担任专业技术德语口、笔译工作。曾陪同中国技术人员前往德国科隆、荷兰福林辛根Hochst公司实习，担任翻译。随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工程技术人员，前往德国多特蒙德Hoesch AG担任工程技术翻译。

曾在德国歌德学院布来梅分院学习，修完德语中二级、中三级、高特级课程。在德国布来梅大学日尔曼语言文学系学习德语语言学及教学法。受德国歌德学院邀请，参加了在慕尼黑总部举办的研究班（Seminar）。

总之，数十年如一日。致力于德语教学、翻译及科研工作。

序

杨艳华女士长期从事德语教学、翻译工作。她利用四度赴德学习、工作、应邀参加研究班（Seminar）等机会，参观、考察了德国博物馆和二战时期留下的集中营，观察了德国社会的现实，收集了德文和中文的相关文献资料，梳理思路，取精用弘，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写成此书。

此书由四篇论文组成：第一篇《第三帝国的思想文化根源》从思想、文化的层面对纳粹（Nazi；Nationalsozialismus 民族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的简称）的产生进行了深入探讨。正如她在本文的开头所说，对第三帝国给德国和全世界人民带来的空前的灾难，人们更多地从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加以解释，而很少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加以考察。第二篇《联邦德国的政治文化》分析了联邦德国在战后迅速崛起的原因：经济上奉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和政治上奉行的民主化政策。这两方面的政策犹如两条腿走路，缺一不可。第三篇《德国古典美学家论审美教育》分析了法国市民阶层和德国市民阶层之间的不同，前者用革命的暴力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而后者由于政治上的软弱，害怕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试图采用美育的手段达到法国市民阶层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第四篇《富于哲理和思想内容的德国文学》探讨了德国文学的特点：哲学和文学的水乳交融现象。正如德语界老前辈冯至先生所指出的：不了解德国文学和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无法真正理解德国文学的。

本书的四篇论文立论精当、论证有力、条分缕析，相信对关心德国思想文化的人士会有所裨益。此书出版，值得祝贺！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日尔曼学教授 洪天富

2008年7月9日

目 次

序	1
第三帝国的思想文化根源	1
联邦德国的政治文化	35
德国古典美学家论审美教育	56
富于哲理和思想内容的德国文学	82

第三帝国的思想文化根源

1933年10月，纳粹头目希特勒攫取政权，在德国建立了法西斯专政，给德国和全世界人民带来了一场空前的灾难。在纳粹统治的12年当中，600万犹太人被杀，千百万生灵涂炭，真是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对第三帝国造成的这场空前未有的惨祸，人们更多地从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加以解释，而很少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加以考察。可喜的是，金重远先生在其《炮火中的文化——文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中独辟蹊径，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富有才华、勤劳朴实、热爱自由的伟大的德国人民怎么会被一位奥地利出生的下士（指希特勒——笔者）弄得晕头转向、走上自我毁灭之路呢？并试图从文化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

无独有偶。早在40年代，德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马斯·曼在《德国与德国人》（1945）这篇演说和《浮士德博士》（1947）这部长篇小说里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一个被人们誉为“思想家和诗人的民族”的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德国民族，何以两次把德国及欧洲人民推入战争的深渊？一个产生过黑格尔、歌德和贝多芬的德国民族，何以在一个狂人的操纵下显露出最原始、最野蛮的兽性，使几千万生灵涂炭？一个产生过优美动听、陶冶情操音乐的德意志民族，何以使德国变为惨叫声不绝的集中营和死一般寂静的坟场？托马斯·曼认为，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德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真正的革命，“德国所有的革命

都是不成功的：1525年的起义（托马斯·闵采尔领导的农民起义——笔者），1813年的运动（反拿破仑侵略的民族解放运动——笔者），1848年的革命（这次革命由于德国市民阶级政治上的软弱而遭到失败——笔者），最后，1918年的革命（指1918年11月革命——笔者）……在战争中产生的普鲁士民族的不幸的德意帝国（1871年诞生的俾斯麦帝国——笔者），只能是军国主义国家。”（《托马斯·曼选集》德文版第12卷，第566，572页）。此外，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德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具有与生活脱节的不幸传统。托马斯·曼在《从我们的经验看尼采哲学》这篇长文里指出，尼采是怀有危险理想的天才疯子，当他宣扬暴力、侵略、战争时，他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对所有这一切残酷的事物，他只有最抽象的、理论的概念，他有关奴役、战争、暴力等等的古怪念头，是智力的不负责任的游戏。“正是德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具有的这种与生活脱节、玩弄智力游戏的不幸传统，使包括托马斯·曼在内的许多德国知识分子成为尼采哲学的俘虏”。

金重远先生和托马斯·曼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思考给笔者以很大的启示。正如金先生所说，战争实质上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抗和冲突，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人类进步文化和反动文化之间的一场大搏斗。第三帝国所代表的人类的反动文化暂时压倒了人类的进步文化，然而人类的进步文化是扼杀不了的，随着第三帝国的垮台，人类的进步文化通过战火的提炼得以净化和升华。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纳粹反动文化赖以产生的阶级基础并没有完全消灭，只要有剥削阶级存在，纳粹反动文化就有死灰复燃的可能。德国新纳粹组织的出现便是明证，它再次向人们昭示，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是和经济基础密不可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讨论第三帝国的思想文化根源，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也具有现实意义。

第三帝国的思想文化根源（或精神支柱）主要有四：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us），种族主义（Rassismus），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和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sozialismus）。

一、反犹太主义

Semit（闪族或闪米特人）原指古代巴比伦人、亚述人、希伯来人 and 腓尼基人等，近代主要指阿拉伯人和犹太人。Antisemitismus（反犹太主义）这个现代词汇，一般认为是由德国现代作家威廉·马尔（Wilhelm Marr）首创。

反犹太主义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它已经由剥夺犹太人的宗教权、公民权发展到彻底剥夺犹太人的基本生存权。希特勒上台后，公开地、大规模地迫害犹太人。1938 年 11 月 9 日深夜至 10 日凌晨，法西斯分子在全国进行打砸抢，焚烧和拆毁了 267 座犹太教堂和一千多座犹太礼拜堂，抓走了两万多犹太人，约七千五百家犹太人商店被洗劫一空。因暴行后街上到处是被砸碎的玻璃，故人们将这一夜称为“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或“打砸抢之夜”。纳粹党徒使用了一切惨无人道和“有效的”屠杀方式，诸如毒气室和焚尸炉，对犹太人进行血腥的屠杀。米克洛什·尼斯利（奥斯威辛集中营中幸免于难的一位犹太医生）在其回忆录《奥斯威辛集中营秘闻》一书中描述了犹太人在地下室被毒死后的惨景：“尸体并不是乱七八糟地平躺在地上，而是簇成一团，堆成塔状，一直垒到房子的顶部。这种现象的惟一解释只能是毒气首先在大厅的底部蔓延开来，继而逐渐上升、扩散到天花板……人们为了求生被迫互相践踏，向上蹿起，一些人踩在另一些人的身上往上爬，爬得高一点，毒气就晚到一会儿，——多么触目惊心、令人毛骨悚然的垂死挣扎！我发现，尸体的底部是一些婴儿、小孩、妇女和老人，而顶部则是一些体格最强壮的男人。”（许家

维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42页）。德国社会学家阿多诺也说过：奥斯威辛之后，用不着再去写诗。据统计，约六百万犹太人丧失了生命。

人们不禁要问，纳粹为何如此残忍地屠杀犹太人呢？对这个问题，西方曾一度流行着这样一种奇谈怪论：说希特勒之所以如此仇恨犹太人，是因为他曾与犹太妓女同床染上梅毒，因而滋生对犹太人报复的心理。还有人说希特勒当年爱上的一位美貌女子被一个有犹太血统的青年人拐走，从而产生了对所有犹太人的愤慨，他本人曾在《我的奋斗》中说过“成百上千个姑娘被可恶的罗圈腿犹太杂种引诱”之类的话，等等。毋庸置疑，这种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希特勒“变态心理”的发掘是站不住脚的。

纳粹的排斥犹太人运动，有其深刻的文化（宗教）和世俗（经济）根源。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曾表白，他“在反犹太主义方面的看法是随着时代变迁逐渐起变化的”。这说明他的反犹思想是在19世纪欧洲盛行的白人优越论、社会有机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下逐渐成熟并最终走向极端的。

反犹太主义有其深刻的宗教根源。犹太教和基督教原本是统一的，但是在公元1至2世纪，原先仅属犹太教下层支派之一的基督教派逐渐脱离正统犹太教而发展成为影响巨大的新的宗教。自从新的宗教基督教产生并独自发展以后，犹太教就遭到了唾弃。在这个意义上，犹太人的受难及西方反犹太浪潮的兴起确实是与犹太教与基督教的神学冲突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西方的反犹运动经历了几次代表性的高潮。最早，信奉基督教并立基督教为国教的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大帝以武力强暴的方式反对犹太人，而犹太人把罗马统治者对犹太人宗教信仰的蔑视看作是对自己的最大侮辱，他们为捍卫自己的宗教信

仰而宁死不屈。在中世纪，剥夺犹太人宗教信仰的权利，强迫他们改变宗教信仰是欧洲反犹太主义者的重要目标。在12、13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为了迫害犹太人而制造了新的“理论根据”，散布“犹太人喜欢在逾越节期间宰杀基督儿童作献祭牺牲”的流言。1321年前后，欧洲流行着这样一个谣传：犹太人收买和唆使众多麻疯病患者将病毒投入水井，从而导致此病在欧洲的蔓延。1348年，欧洲有一千多万人死于黑死病，生活在城市中强行划定的犹太人居住区（Getto）中的犹太人因与外界隔绝，故染疾者较少，但犹太人的这一幸运反而成了他们的不幸，他们被诬是带来黑死病的罪魁祸首而被强迫佩戴黄色标记。

18世纪在欧洲兴起的启蒙运动，强调人的价值，反对宗教迫害，主张不同的宗教应该相互宽容，和睦相处。德国启蒙运动者莱辛正是出于对宗教不容异说的强烈反对，才成为最受宗教不容异说迫害的犹太人的拥护者。他在自己的剧本《犹太人》（1749年）中，特别是在《智者纳旦》（1779年）中，勇敢地让犹太人作为正面形象登上了德国的舞台。他在《智者纳旦》中问道：“难道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只是基督教徒和犹太人，而不更是同样的人吗？”他以自己的朋友，犹太人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为原型描写了剧中的主人公纳旦：“他的崇高灵魂多么不带偏见，他的心胸中蕴藏着多少美德，多么富于美好的感情，啊，他是一个多好的犹太人，但他却只愿做一个犹太人。”莱辛借助三个戒指的寓言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应该相互尊重，互相容忍，共同促进人类的进步。

启蒙运动虽然给欧洲带来了一定的宗教自由，但是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的对立并未因此消除。在19世纪，欧洲的反犹太主义有了新的发展，在德国，它甚至成为帝国政策的一部分，例如在1815年，德国就曾出现过由雅恩（Fr. Lud. Jahn，

1778—1852)领导的体育协会,它大肆宣传反犹太主义,其成员一律穿着灰色制服。这个时期欧洲的反犹太主义特点是:以往自发性的反犹活动往往演变为有组织、有计划的排犹运动;反犹太主义亦从中世纪的以宗教歧视、宗教迫害为主发展为以种族歧视迫害为主,反犹的最终目的不仅在于剥夺犹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更在于的剥夺犹太人的基本公民权利。

长期以来,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世界对犹太人形成了确定的思维定势:“犹太人”不仅获得了特定的文化语义,而且获得了特定的社会涵义。“犹太人”成为“恶”的化身。萨特在其《反犹太者的画像》一书中,不仅揭示了西方反犹太主义者的心态,而且还以自己亲身的经历揭露了不少西方人的“反犹太怪癖”、“犹太人是根本坏的,是根本犹太的……犹太人和基督徒所作的同样的事情,无论如何绝不相同。犹太人使得他触摸过的每种事物都成为可恶的东西。德国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禁止犹太人到游泳池,因为犹太人的身体投入水中就会把水根本弄脏”,“我曾询问过上百的人为何要反对犹太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回答说,‘我恨他们,是因为他们自私、阴险、难打发、油滑、粗拙’等等。”(见该书第34-35页)。我们应该记得莎士比亚笔下那个威尼斯商人——犹太高利贷者夏洛克,他不仅贪婪,而且嫉贤妒能。德国浪漫派音乐大师瓦格纳(Richard Wagner, 1813-1883),同样对犹太人怀有强烈的偏见,他在《音乐中的犹太主义》一文中,鼓吹日尔曼人至上,宣传反犹思想。

纳粹反犹,除了宗教文化的原因以外,还有世俗的(经济的)原因。众所周知,生活在基督教世界的犹太人,因其生存环境的天然压力,只有以百倍的努力方能换得相应的生存保障。他们把压力变为动力,在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里常常取得了超凡的成就。据统计,1919—1933年(魏玛共和国时期),38

名获诺贝尔奖的德国科学家中便有 11 名是犹太人，几乎占获奖总人数的 1/3。犹太人因其特定的传统和经历而形成某种特殊的身份——商人（莎翁笔下的夏洛克，莱辛笔下的纳旦）。在商业性活动中，犹太人靠经商天赋和技巧常常获利甚至发财。这种商业行为和获利原则（有利和利己原则）无疑极易造成商业阶层与非商人阶层之间的差距、隔阂和不信任。

众所周知，由于 1918 年 11 月革命的结果，犹太人在德国获得了和德国人一样的平等的公民权。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的犹太居民在中小企业和商业领域里和德国人展开了激烈的经济竞争。不少加入德国籍的犹太公民在文化、新闻和政治领域里占据显赫的地位。由于犹太人生活在世界各地，这种情况促使他们秘密地建立全世界犹太人的互济计划。这被纳粹认为是针对德国和全体德国人的。为了煽动德国人对犹太人的不满，纳粹制造了种种谎言，例如，纳粹散布谎言说，犹太人为了实现他们的互济计划，由犹太银行家出面联合国际财政金融寡头，共同操纵所有的左派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纳粹依靠自己制造的谎言，把国内发生的一切坏事归咎于犹太人的“阴谋”。因此，剥夺犹太人的生存权利，成为纳粹的当务之急。在由 25 点组成的纳粹经济纲领里，就有 5 点是针对犹太人和非德意志人的：

3. 把犹太人和所有非德意志人赶出社会生活中责任重大的岗位。

4. 禁止犹太人和其他过寄生生活的外国人从东欧移居德国，可以把令德国人厌烦的外国人和犹太人驱逐出德国。

5. 只有准备和日尔曼民族共同体共命运和接受日尔曼文化的德国人才能享有公民权。

6. 只作为客人有权生活在德国的外国人应遵守有关外国人

的法令。

7. 德国人的权利和利益较之其他民族的代表的权利和利益处于优先地位。

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是逐步升级的。有一次，但泽市政府主席劳施宁（Hermann Rauschning，1887，德国政治家，1936 年逃往瑞士，后流亡美国）问希特勒，是否马上消灭所有的犹太人。希特勒回答说：“不，在我们尚未找到取代他们的人之前，我们暂时不要动手。因为我们面临的始终是非常具体的对手，而不是纯粹的抽象概念”。的确，在当时，犹太人是纳粹党徒的强大的对手。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国有 53 万犹太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中起着显著的作用。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从事科学活动、行医和当律师。全德国有几万家工商企业和饭店属于犹太人。

纳粹首先采取“雅利安化”的措施，把犹太人的财产转交到成千上万纳粹党徒的手里。例如，在巴伐利亚州的富尔特（Fürth）地区，犹太公社的价值为 57000 马克的地产被希特勒分子以 100 马克买去。从表面上，这就是一种商业交易，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变相的掠夺。纳粹以这种卑鄙的手段，除去了自己的竞争对手。继而从 1938 年底开始，纳粹采取打、砸、抢的手段，公开掠夺犹太人的财产。最后发展到集体屠杀在德国和从其他国家俘虏来的犹太人。

二、种族主义

种族理论是纳粹的理论枢纽。所谓的 25 点经济纲领只是一种应急手段，旨在“从遗传上改进德意志种族，使它免遭种族杂交”，因为在纳粹党人看来，杂交总要导致“高级种族”的衰落。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明确写道：“雅利安人的最大对立

面就是犹太人”，“对种族问题和犹太人问题如果没有清楚的认识，德意志民族就不会复兴”。（参见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第281页）。

种族主义并非是纳粹的专利。在欧洲，种族主义曾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种族歧视不仅针对犹太人，也针对欧洲和东方的其他有色人种，甚至欧洲人内部也有所谓优劣之分，东欧斯拉夫人也曾遭到西欧诸人种的歧视。黑格尔曾经说过，“世界精神（Weltgeist）最后所选中的民族是德意志民族。”（见张世英：《论黑格尔的哲学》，第10页）。自诩为“爱国主义作家”的英国小说家和诗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1865 - 1936）主张以诗歌唤起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帝国自觉心，号召人们远涉重洋去开拓殖民地。他在一首题为《东方和西方》的诗中写道：“西方就是西方，东方就是东方。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永不会变，直到神的最后审判……”作品充满扩张精神，因而被人称为“帝国主义诗人”。

欧洲种族主义者（白人优越论者）和殖民主义者在全世界的种族歧视和暴虐行径，曾引起世界人民（包括西方正义人士在内）的强烈谴责。法国伟大作家雨果在得知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丧心病狂地抢掠和焚烧了世界瑰宝圆明园的消息之后，在给一个名叫巴特雷的法军上尉写的回信中愤怒地谴责了英法强盗的罪恶行径：“两个强盗走进了圆明园，一个抢掠，一个放火。可以说，胜利是偷盗者的胜利，两个胜利者一起彻底毁灭了圆明园。”1994年9月，江泽民主席访问法国时，重读雨果这封信，依然有十分强烈的感受。他在将这封信的原文和译文送给宋健等同志阅时指出：“这对我们都是次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见1997年9月7日《南方日报》）。

在欧洲种族主义者眼里，犹太人是头号“劣等民族”，这除了上述的宗教和世俗的原因之外，另一个使西方人恼怒的原因

或许在于犹太人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并“坚信不移”，这无疑是西方“优等民族”所不能容忍的。在欧洲，就连百科全书派领袖伏尔泰也认为犹太民族是“一个无知和野蛮的民族，他们长期以来将难填的欲壑、最可恶的迷信和对所有宽容并使他们致富的人们最隐密的仇恨结合在了一起。”（查姆·伯曼特《犹太人》，冯玮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3页）。

19世纪最后30年，随着德国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受德国垄断资本操纵的泛德意志协会应运而生。这些协会接过法国作家郭比诺伯爵（Gobineau, 1816 - 1882）的白人优越论（郭比诺将人类划分成优等民族与劣等民族，白人，尤其是雅利安人，当然是优等民族，其他的人种则是劣等民族），叫嚣德意志民族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征服和统治全世界。德国种族主义者承袭了郭比诺的衣钵，断言种族之间的区别不仅表现在生理上，而且表现在精神上，所以种族之间的杂交必然导致生理上的退化，进而导致文化的衰落与灭亡。在所有的种族中，最有价值和最有修养的是雅利安种类，尤其是日尔曼种族。德国种族主义者还把英国人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 1855 - 1927）的种族理论奉为圭臬。张伯伦是德皇威廉二世的朋友和音乐家瓦格纳的女婿，自加入德国籍以后，他和德国种族主义者沆瀣一气，鼓吹德意志民族应雄居世界各民族之首。

在郭比诺和张伯伦的影响下，德国种族主义者纷纷“著书立说”，鼓吹德意志种族优越论。德国哲学家和东方学家拉加尔德（Paul Anton de Lagarde, 1827 - 1891）主张恢复远古时代的纯日尔曼宗教和纯日尔曼文化，把所有非日尔曼的异族因素从德国文化中清除出去。哲学家尼采也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优秀民族（Herrenrasse，或译主宰民族），而主宰民族就是白肤、金发、碧眼的雅利安种族，它定将“主宰全世界”。1913年，泛日尔曼协会的《泛德报》公开宣称，“世界上只有两种种族：主